

多重敘事下的地方生成

◎ 林晃

「地方」之珍貴，在於它超越了純粹的物理空間。人文地理學大師段義孚曾言：「如果我們將空間視為容許移動之所在，那麼地方即是暫停。」香港的「地方感」，便在這「暫停」與凝視中油然而生。它不僅是地理的，也是情感的和意義的，更是人們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因此，構建香港，本質上是一場持續的認知與表述實踐。地方志編撰，是以史筆為這座飛速變幻的都市打下時間的錨樁，在檔案與田野中辨認其來路；而散見於十八區的民間刊物，則如社會的毛細血管，以最貼地的日常書寫，記錄茶餐廳的熱氣、街市的話語、鄰里關係的變遷，編纂了一部活潑潑的「庶民正史」。

建築與空間亦然，從唐樓的騎樓到摩天大廈的玻璃幕牆，從圍村的宗祠到現代的公共屋邨，每一種空間形式都是一種社會關係與價值體系的陳述。它們共同構築了一座可閱讀的城市，其中既包藏全球資本的邏輯，亦蘊涵草根生命的頑強。

然而，在所有的書寫中，文學或許賦予了香港最為靈動與深邃的靈魂。美國著名文學批評家希利斯·米勒將「地志學」解讀為「對某個地方的書寫活動」。香港文學，正是這樣一場蔚為大觀的「地志書寫」。它創造了獨特的「文學地景」，使地理空間因情感的灌注、記憶的附著而昇華為意義飽滿的「地方」。我們對這座城市的認知，始終難以擺脫那些深入人心的文學意象——也斯筆下的屯門，西西眼中的我城，王家衛鏡頭裏的重慶大廈。它們如同幽靈，棲居於實體空間之上，賦予其故事與性格。

由此觀之，香港的地方構建，從來不是完成時，而是持續的進行時。它是一場學者、作家、社區記錄者、規劃者乃至每一位市民共同參與的宏大敘事。對歷史的考證，對街區的記錄，對空間的設計，以及文學中的想像，都在為香港這個「地方」增添新的註解和圖層。在全球化浪潮企圖消弭一切差異的今天，這種自覺的、多元的書寫更顯出其抵禦性價值——它對抗遺忘，對抗單一的詮釋，守護著地方的豐富性與可能性。

本期文化焦點以香港的地方構建為主題，試圖剝離那些不言自明的標籤，探向一個更為根本的命題：香港作為一個「地方」，其獨特的肌理、溫度與靈魂，究竟如何被感知、被言說、被創造？我們發現，答案深植於無數重疊交錯的書寫之中——從嚴謹的方志考據到街頭巷尾的社區刊物，從冷峻的建築線條到熾熱的文學想像。香港，終究是一個被多重敘事反覆構建的文本之城。

目錄

CONTENTS



文化焦點 *香港營造方式*

- 004 香港何從：「小漁村」意象後的城市拼圖 金敏華
- 013 地方刊物：建構在地生活的視角 蔡寶賢
- 019 空間裏的日常：香港建築三十年人文觀察 薛求理
- 025 以文學，造地方：香港文學中的地方建構 黃峪

書人書事

- 032 楊振寧：百年圓夢報國恩 閔捷
- 038 國破山河在：試論葉嘉瑩、許倬雲二先生的中國關懷 馮俊文
- 047 思變者柯文：一位歷史學家的中國旅程 毛升



學思隨筆

- 054 啟蒙的未竟之路：公共史學如何建構民眾史觀？（上） 王笛
- 066 清代不可能有「青天大老爺」：《杜鳳治日記》點註札記之一 邱捷

出版內外

- 098 讀《出版筆記》：劉杲先生與他的出版世界 汪家明

專欄

- 072 舊書今讀 | 魯凡之：香港馬、毛思想理論「掃地僧」（上） 蔡思行
- 078 東瀛書話 | 在虛構中逼近真實：原田舞葉的藝術小說 孫海玉
- 083 唱和新集 | 香港藝文往來敘錄 周光葵

書評

- 105 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與復興 唐小兵
- 109 山城香港的營山與造城 龐涇
- 114 容膝的廣袤：陳鳴華詩集《句敘》閱讀札記 王新語
- 117 王雲五，一位奮鬥的典範：讀《苦鬥與壯遊：王雲五評傳》 丁凱
- 122 不斷流動的異類之軀：讀《世界的白蛇：越界與重生之力》 吳雙

華文風采

- 086 劉以鬯的南洋書寫與「三毫子小說」 王艷芳

共讀雙城

- 091 屯門：深港雙城的文化原點 木木

閱讀前線

- 126 12本書，12個閱讀理由

啟蒙的未竟之路： 公共史學如何建構民眾史觀？(上)

◎ 王笛

現任澳門大學講座教授，曾任美國德克薩斯 A&M 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關注中國社會史、城市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和微觀史的研究。代表著作有《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游社會研究(1644–1911)》《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袍哥：1940年代川西鄉村的暴力與秩序》等。

五四時期是一個啟蒙的年代，引導時代潮流的中國知識分子，擁抱民主與科學，但並沒有對歷史觀進行深刻的反思。實際上，現代中國急需一個歷史觀的啟蒙，其重要性可以說不亞於對民主與科學的追求。在幾千年的中國歷史長河中，主宰民眾對歷史認識的一直都是帝王史觀和英雄史觀，而且在近代以後，基本未對此進行一個徹底的清理。迄今為止，我們的歷史學家所撰寫的幾乎所有的中國通史，以及從小學、中學到大學的中國歷史教材，都是以王朝和帝王為中心的。這種以王朝和政治權力為核心的歷史觀，成為當今中國社會認識歷史的最主要的理論資源。這種歷史觀不僅簡化了歷史的複雜性，也導致了人們對歷史的片面理解。因此，重新審視歷史觀的問題，尤其是從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視角出發對其進行審視，在今天就顯得尤為重要。

本文強調從帝王史觀轉向民眾史觀的

必要性，指出歷史不只是帝王將相的功績與榮耀，更是千千萬萬普通人的生活與奮鬥。通過對歷史的多元解讀，我們能夠透過歷史表面的塵埃去發現歷史的實質，更全面地理解歷史事件、過程及其對當代社會的影響。強調普通人在歷史中的作用，不僅能夠豐富我們的歷史理解，而且提供了認識當代社會結構和權力關係的基礎。通過對歷史和歷史觀的批判性分析，我們能夠識別出歷史敘述中的偏見與誤導，從而更好地理解歷史的真實面貌。

什麼是歷史？

人類社會過去所發生的一切，都可稱為歷史。我們所說的歷史有兩種，一種是過去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第二種是歷史學研究者根據有限的資料對已經發生的歷史進行的重新建構。本文主要討論第二種歷史。而第二種歷史有非常強的主觀色彩，

哪怕依據同樣的史料和同樣的方法，也可能寫出不同的歷史，甚至寫出完全不同的歷史。這是因為研究者在資料的選取、理解、解讀、闡述、分析、討論等方面的不同，更不要說其還受到地域、民族、情感、教育、家庭出身、經濟地位、政治觀點、意識形態的影響。

第一種歷史是非常複雜的，歷史事件被記錄下來留給歷史學家撰寫第二種歷史的依據是非常有限的，用一個更直觀的表達，存世資料可能不足原貌的百分之一。幾十年、幾百年甚至幾千年之後，歷史學家試圖利用這不到百分之一的數據，去重構歷史，我們可以想像，他們所寫的歷史與歷史的真相到底有多近或者有多遠的距離。因此，我們都必須知道，歷史記載和歷史寫作常常只是一種歷史的表達方式，是為歷史學家所生活的那個時代服務的，反映的是那個時代對過去歷史的理解。

這也就是為什麼歷史學家克羅齊認為「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他強調的正是歷史書寫的主觀性：歷史的編纂和理解往往受到當代社會、文化和政治背景的影響。歷史學家在研究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時，會受到自己所處時代的觀點和意識形態的制約，因此對歷史的解讀常常反映當代的價值觀。這一論斷也顯示了歷史的相關性，它在暗示我們，歷史並不是孤立存在的，而與當代社會息息相關。人們通過

對歷史的研究，理解和解釋當代的問題和現象，歷史為當代提供了經驗和教訓。克羅齊也表明了歷史的動態性，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變革、科技進步等因素都會影響人們對歷史的理解。歷史的編纂和解讀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新的視角和方法可能會改變我們對過去的看法。

尼采在《歷史的用途與濫用》中說：「歷史，只要它服務於生活，就是服務於一個非歷史的力量，因此它永遠不會成為像數學一樣的純科學。生活在多大程度上需要這樣一種服務，這是影響一個人、一個民族和一個文化的健康的嚴肅的問題之一。」因為，「由於過量的歷史，生活會殘損退化，而且歷史也會緊隨其後同樣退化」。所以，正如尼采已經指出的，歷史不是一門科學，它不能像科學一樣，結論是可以反覆驗證的，所以我們把歷史學歸入人文學，而不是社會科學。

尼采區分了歷史的三種用途：紀實、批判和懷古。他認為，適度地使用歷史能夠幫助人們理解現實、激勵創造和推動個人的成長。他提倡在生活中應以生命的需要為導向來使用歷史，而不是讓歷史限制個人的發展和自由。在尼采看來，生活始終是至高無上的，了解歷史正是為了服務於生活。歷史的紀實、批判和懷古這三種用途，對應著不同人群的需求和生活狀態。對於希望有所建樹、正在奮鬥的人來

說，歷史可以為他提供榜樣和鼓勵，他所需要的便是紀念式歷史；一個有保守與虔敬天性的人，希望從歷史中找到自己存在的源泉，使自己獲得歸屬感，他所需要的便是懷古式歷史；而一個希望有所革新的人，則需要打破舊事物的約束，從而用新的東西來取代它，這樣的人所需要的便是批判式歷史。在尼采看來，歷史的功能在於服務生活，這是理解歷史的核心。他強調，歷史不應被視為一門抽象的科學，而應當與人類的實際生活緊密相連。當歷史能夠幫助人們理解現實、激勵創造和推動個人成長時，它便實現了其真正的價值。但是，過度依賴歷史或沉迷於歷史，被歷史的沉重包袱所壓倒，可能導致生活的「殘損退化」。

E. H. 卡爾在《歷史是什麼？》中指出：「歷史是歷史學家與歷史事實之間連續不斷的、互為作用的過程，就是現在與過去之間永無休止的對話。」此語強調了歷史的動態性質，特別是歷史學家與歷史事實之間的互動關係。他認為，歷史並不是簡單的過去事件的累積，而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充滿了解釋、理解和再解釋的可能性。「現在與過去之間永無休止的對話」意味著歷史學家在研究歷史時，不僅要回顧過去，還要將當下的視角和理解融入歷史的解讀。這種觀點揭示了歷史的重要性，強調了歷史理解的主觀性和相對

性。歷史學家在選擇、解釋和呈現歷史事實時，受到自身所處的社會文化背景、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影響。此外，所謂「對話」也反映了歷史的多元性。不同的歷史學家可能會基於相同的歷史事實得出不同的結論，從而形成多種歷史敘述。

卡爾·波普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闡明，「歷史」並不是一個不言自明的概念，「大多數人所說的那種意義上的『歷史』根本就不存在」。那麼，大部分人是如何理解「歷史」這個詞的呢？波普爾認為，其實他們所指的是「政治權力的歷史」。但是，政治權力的歷史不過是歷史的一個方面。政治權力被看成歷史的全部，其實「是對一切得體的人類概念的冒犯」。他認為，歷史決定論（或者歷史主義）就是權力崇拜，「權力崇拜是人類最壞的一種偶像崇拜」。波普爾的觀點強調了歷史的多元性，歷史不僅是政治事件和權力鬥爭的記錄，還是一個更加廣泛和複雜的領域，涵蓋了文化、經濟、社會、思想等多方面的演變。將歷史簡化為政治權力的歷史，實際上是對歷史本質的誤解。這種狹隘的理解使歷史的豐富性和多樣性被忽視。人類的歷史不僅是權力的更替和鬥爭，還包含了人類在科學、藝術、道德和社會組織等領域的探索與發展。因此，波普爾呼籲，我們應當以更加全面和包容的視角來看待歷史。

歷史決定論實際上是將歷史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簡化為固定的模式，認為歷史的發展是線性且必然的。這種觀點不僅限制了人們對歷史的理解，也壓制了個體的自由意志和創造力。歷史決定論往往將歷史的發展視為某種不可避免的命運，從而將政治權力的變化視為歷史的全部。這種思維方式容易導致對權力的崇拜，因為它將權力看作歷史發展的主要驅動力。波普爾認為，這種權力崇拜忽視了個體的價值和潛力，導致對自由和人性的壓制。權力崇拜危害巨大，那些掌握權力者利用歷史決定論來為其統治正當化，聲稱他們的權力是歷史的必然產物，從而壓制任何反對的聲音。權力崇拜使得個體的聲音和選擇被忽視，人們在面對權力時，失去批判性思維和獨立判斷的能力。這種狀況不僅對社會的進步造成阻礙，也使得權力的濫用和腐敗得以滋生。

中國歷來重視歷史的寫作和記錄。梁啟超說：「於今日泰西通行諸學科中，為中國所固有者，惟史學。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其半焉。」梁啟超的這句話，強調了歷史學在國家和民族發展中的重要性。他認為，歷史不僅是知識的積累，更是民族認同和政治進步的基礎。認為史學乃「學問之最

博大而最切要者」，表明了他對歷史學廣泛性和重要性的認可。歷史學不僅涉及過去的事件和人物，更涵蓋了文化、思想、社會結構、經濟發展等多個方面。歷史學的博大體現在其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人民生活等多個領域有密切的聯繫，能夠幫助我們全面理解人類社會的發展和變遷。梁啟超將歷史稱為「國民之明鏡」，強調了歷史在塑造民族認同方面的作用。又說歷史是「愛國心之源泉」，表明了歷史在激發民族情感和增強愛國主義意識方面的關鍵作用。

什麼是帝王史觀？

歷史觀是指人們對歷史的理解、解釋和評價的觀點和態度。它涉及對歷史事件、人物、過程和意義的看法，反映了個體或群體在特定歷史、文化和社會背景下形成的理解。歷史觀不僅影響人們對過去的理解，也影響對當前事件和未來發展的看法。歷史觀往往受到個人經歷、文化背景、教育程度和社會環境的影響，因此不同的人或群體可能會對同一歷史事件產生截然不同的看法。

歷史觀並不是單一的，而是多元的。不同的歷史傳統、文化和意識形態會產生多種歷史觀。歷史觀也不是永遠不變的，會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的發展和新證

據的出現而變化。人們可能會重新評估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形成新的理解。歷史觀提供了一種解釋歷史的框架，幫助人們理解複雜的歷史現象。決定論歷史觀認為歷史的發展受到特定因素，如經濟、社會結構、自然環境等的決定，個體的自由意志在歷史進程中顯得有限；多元歷史觀強調歷史的複雜性和多樣性，認為不同文化、民族和社會的經歷和視角都應該得到重視。

循環歷史觀認為歷史是循環往復的，某些事件或模式會不斷重複，強調歷史的週期性，黑格爾所謂的中國是「一個沒有歷史的文明」(a civilization without history)就是這樣的歷史觀。黑格爾認為，歷史是精神發展的過程，而西方文明，尤其是德國和希臘文明，體現了歷史的進步觀念。他認為，中國文明缺乏這種歷史意識，更多地關注傳統和穩定，而非歷史的變化與發展。中國的歷史呈現出一種循環的特徵，強調重複和保持傳統，而西方則注重進步和發展。這種循環性導致中國文明在某種程度上缺乏對歷史變革的深刻理解和反思。但是到了今天，無論是西方還是在中國，信奉黑格爾循環史觀的歷史學家，恐怕可以說是寥寥無幾了。

線性歷史觀認為歷史是一個線性的發展過程，從過去到未來不斷進步，唯物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可以說就是這樣

一種史觀，認為人類的歷史就是按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最後到共產主義社會這樣一條線發展的。從 20 世紀中期開始，中國佔統治地位的便是唯物史觀，即歷史唯物主義，或者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這種史觀強調物質生活條件在歷史發展中的基礎作用，認為歷史的發展主要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而經濟基礎又影響著上層建築，包括政治、法律、文化等方面。唯物史觀的核心觀點包括：歷史的發展是由生產力的變化和生產關係的調整推動的，生產力的提高會促使社會形態的變遷。根據唯物史觀，經濟基礎決定了上層建築，歷史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社會的發展往往伴隨不同階級之間的矛盾和鬥爭，而且歷史的發展是有規律可循的。

其實歷史唯物主義或者唯物史觀，只是現代中國歷史學主流的一個外表，如果我們仔細考察它的深層結構，其核心的內涵是帝王史觀和英雄史觀，而且這種史觀是從中國古代到近現代一以貫之的。帝王史觀主要關注國家和統治者的歷史，強調帝王將相在歷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它往往以政治權力的更迭、王朝的興衰為中心，認為歷史的進程主要是由統治者的決策和行為所推動的，忽視普通百姓的生活和社會底層的歷史。

司馬遷的《史記》作為中國歷史上

最早的紀傳體史書，通過對歷代帝王的記載，展示了帝王的權力與統治，以及他們在歷史中的重要性，體現了帝王史觀的基本特徵。《史記》分為本紀、表、世家、列傳和書，「本紀」是《史記》的主要部分，共有十二篇，主要記錄帝王的事蹟和統治情況。從黃帝到漢武帝，詳細描述了各位皇帝的生平、治國方針、在位時的重大事件及其對國家的影響等。「表」主要以表格的形式列出歷史事件的時間順序和重要人物的關係，共有三大類。它們分別是「年表」、「世表」和「月表」，提供了直觀的歷史時間線和人物關係，便於理解歷史脈絡。

「世家」有三十卷，主要記錄各個重要家族的歷史，尤其是諸侯王、顯赫家族及其後代的事蹟。通過「世家」，司馬遷展示了各個家族在歷史發展中的地位和影響，以及他們與中央政權的關係。「列傳」部分有七十篇，主要記錄歷史上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蹟，包括政治家、軍事家、文人、思想家等。「書」主要包括對某些特定主題或領域的討論，如《律書》、《樂書》、《封禪書》等。這些「書」不僅提供了對各個領域的歷史和文化的回顧，也展示了司馬遷對當時社會各方面的觀察與思考。

司馬遷《史記》被後世史學家視為典範，但也是帝王史觀的始作俑者。其非

常強調地位的尊卑之別，從本紀到列傳，歷史人物是以身份來劃分的，帝王將相的功績與權力貫穿了整個歷史敘述。《史記》強調忠君愛國，個體行為和思想在此基礎上才有價值。司馬遷對暴力和征服著筆甚多，他筆下的秦王橫掃六國、李廣遠征匈奴、霍去病出兵西域等，均為渲染帝王事功的「宏業」。這導致後來的歷史記錄和寫作，幾乎都圍繞王朝的興衰更替，千千萬萬的民眾被歷史遺忘了。

不過，應該看到，司馬遷在記錄帝王事蹟時，常常加入自己的道德評價，指出統治得當與否對王朝的影響。這種道德層面的分析超越了簡單的帝王史觀，使歷史不僅是權力的記錄，也包含了對治國理政的反思。儘管《史記》中的許多內容集中於統治者，司馬遷也在「列傳」部分記錄了許多非帝王的歷史人物，甚至販夫走卒，如「刺客列傳」、「滑稽列傳」等，展示了不同社會角色對歷史的影響。但是隨後官修的二十四史，則越來越遠離司馬遷這個非凡的歷史寫作角度，完全滑向了帝王史觀。

梁啟超在《新史學》中指出，以帝王為中心的歷史寫作，其結果就是國民「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而中國人引以為自傲的沒有間斷的歷史，「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這種歷史觀使歷史成為權力鬥爭和帝王業績的記錄，

記錄的是皇族和權貴的家族譜系，而非國家發展和社會變遷的全景。在這種歷史觀下，國家的概念被簡化為朝廷，歷史書寫不能真實反映人民的命運，導致世代相傳的歷史缺乏對社會層面的深刻理解。梁啟超的觀點其實表明對歷史寫作的重新審視可為現代史學的發展鋪平道路。但遺憾的是，一百多年來，我們並沒有對傳統的歷史觀和歷史寫作進行徹底的反思。

帝王的事業與百姓的血淚

在帝王史觀的主宰之下，神聖化統治者，對民眾持戒備態度，實際上成為了古代中國的一項國策。商鞅《商君書》中的《弱民》篇說：「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在商鞅看來，人民處於弱勢，國家才能強大。弱勢的民眾更容易被統治和控制，國家可通過集中權力來實現政策目標，而不必擔心民眾的反抗。主張通過「弱民」來實現國家的強盛，即通過控制和馴化民眾，減少他們的自主和權利，維護國家的穩定和強大。治國理念是站在國家的立場上還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就會做出完全不同的判斷。

在帝王時代，普通人如同螻蟻，帝王在爭奪政治權力時更是互相殘殺。他們窮奢極欲，憑藉君主的威權與王朝的財力進行專制統治，包括那些所謂「偉大」的君

主：漢武帝頻繁的遠征，付出了「海內虛耗，人口減半」的代價；唐太宗爭奪皇位繼承殺害兄弟，為了權力喪失了基本的人倫；康、雍、乾三朝大興文字獄，更是對文化人肉體和精神的無情摧殘。但是在官方的歷史中，他們卻不斷地被美化、被頌揚、被崇拜。

為了鞏固皇權專制，官僚機構和官僚隊伍的規模越來越龐大，而這些官僚機構都是建立在對人民的壓榨之上。實際上，中國歷史上的每一次農民起義，都是由於專制王朝對人民的殘酷壓迫，把農民逼上絕路而發生的，是「官逼民反」，是民與官的矛盾，並非主要是我們現代歷史書所經常總結的農民與地主的階級矛盾。權力完全集中於皇帝個人，統治集團維護的是皇帝的私利及其官僚統治階級的既得利益。

皇權專制制度是中國兩千餘年間所有苦難和罪孽的總根源。正如譚嗣同在其《仁學》中所論：「由是二千年來君臣一倫，尤為黑暗否塞，無復人理，沿及今茲，方愈劇矣。」這是對君臣關係的批判，這裏的「黑暗」與「否塞」，暗示了政治環境的腐敗與昏暗，意味著統治者缺乏明智的治理，臣子們也失去了應有的理智和慈悲，形成了一種失去人性的社會狀態。譚嗣同提到秦始皇的統治以極權和暴力為特徵，強調君主的絕對權威，而臣子

則被壓制到卑微的地位。中國歷朝歷代的統治者往往只關注自身的權力和利益，使得統治體制更加腐敗。

中國歷史上充滿帝王和英雄無謂的爭鬥，其實在羅貫中的《三國演義》開篇引用的那一首詞，已經道出了對於帝王和英雄的嘲弄：「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此詩揭示了歷史的無常和人類爭鬥的徒勞。「滾滾長江東逝水」象徵著歷史的浩蕩與無情，時間將所有英雄和帝王的爭鬥沖刷成了往事，顯示出歷史的變遷與人事的短暫。將地球的生命與個體的生命進行比較，可以引發對人生、價值觀以及權力慾望的深刻思考。地球的歷史大約有四十六億年，人類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大約兩百萬年前，現代人類（智人）大約在三十萬年前出現，並逐漸演化和發展，而具體的人類文明的歷史則大約有幾千年的記錄。個體的成就和權力在歷史的長河中顯得微不足道，但人們對於權力瘋狂的慾望，卻讓許多有所謂雄才大略的人奮鬥一生，樂此不疲。

「浪花淘盡英雄」體現了英雄人物在歷史長河中的渺小，儘管他們曾經輝煌，但最終也難逃被歷史遺忘的命運。「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則強調了事物

的相對性，勝負與成敗都是瞬息萬變的，唯有自然與時間永恒不變。在三國時期，「英雄」們為了權力和地位展開的爭鬥，最終導致了無數人的死亡，這不僅是對個人命運的影響，更是對整個社會和歷史進程的巨大衝擊。歷史的長河中，許多帝王和英雄在權力的驅動下，往往忽略了更深層次的人性與道德，最終留下的只有悲劇和遺憾。「是非成敗轉頭空」，為了權力而進行的鬥爭，最終都被歷史遺忘，留下的只有歷史的教訓和對人類行為的反思。儘管在當時，這些鬥爭可能被視為英雄行為，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會認識到這些爭奪背後的代價——生命的流失和社會的動盪，而付出最大代價的往往是普通人。

許多無謂的爭鬥和鮮血提醒我們，真正值得讚頌的不是那些在戰爭中取得勝利的人，更是那些能讓老百姓過自己的日子、在歷史上沒有什麼業績可以記載的統治者，可惜這樣的統治者少之又少。我們常說：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像安祿山、秦檜等固然是歷史的罪人，但是他們上面握有絕對權力的皇帝又何嘗不是罪人呢？一個封建王朝的滅亡，對老百姓意味著什麼？我們今天唏噓於一個王朝的滅亡，是因為我們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上，而從一個老百姓的角度來看，其實無非換了另外一個統治者。